

# 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医经典研究 ——以王士雄“暑湿”思想为例\*

庞森森, 尚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

**摘要:** 诠释学的阐释方式与中医经典思维特点具有高度一致性, 为中医经典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清代医家王士雄基于前人理论, 否定“阴暑”“阳暑”论, 提出“暑多兼湿”创新思想, 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王士雄认为, 热邪甚者应选用苦寒的凉性药物, 配合宣化气机的药物; 湿邪的治疗“宜宣、宜燥、宜利”, 且以泄法作为辅助; 若湿邪兼并热邪, 则应该“清宣疏化”并重。以王士雄暑湿思想为例可知, 中医经典的训诂与注解、中医自身的实践性特征以及中医师承相授等特点, 都决定了诠释学在中医经典研究中必将发挥独特作用。

**关键词:** 王士雄; 暑湿; 王氏清暑益气汤; 诠释学; 中医经典

**DOI:** 10.16368/j.issn.1674-8999.2024.09.305

**中图分类号:** R254.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99(2024)09-1847-05

## Stud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from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 Taking Wang Shixiong’s Thought of "Summer Heat – Dampness" As an Example

PANG Sensen, SHANG L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201203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meneutics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his predecessors, Wang Shixiong, a physician in the Qing Dynasty, denied the theory of "Yin Shu and Yang Shu" and put forward his innovative idea of "Shu (summer – Heat) being always accompanied with Dampness", hence he created Wang’s Qingshu Yiqi Decoction. Wang Shixiong believed that with severe Heat evil factor injury, bitter and cold drugs should be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drugs functioning in dispersing and activating Qi movement; The treatment of Dampness evil factor is in "dispersing, drying and removing", and is assisted by the method of catharsis; If the Dampness evil is accompanied with Heat evil factor, in treatment "clearing Heat and dispersing Qi to relieve the symptoms" should be used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Wang Shixiong’s thought on summer – Heat and Dampness as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in exegesis study and commentary of TCM classic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tself, the inheritance and teaching of TCM physicians all determine that hermeneutics play a unique role in the study of TCM classics.

**Key words:** Wang Shixiong; summer – Heat and Dampness; Wang’s Qingshu Yiqi Decoction; hermeneutic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

诠释学是一门来源于西方的新兴学科, 17 世纪诞生于德国, 最早被应用于宗教和法律条文的解释

等。18 世纪后, 受施莱尔马赫等学者的影响, 诠释学开始脱离了神学教义成为普遍理论, 用于解释和理解各学科和理论, 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20 世纪以来, 诠释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并被应用于中医经

\*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1BZX005)

典的探讨之中,以阐释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中医经典的内涵和临床特色,挖掘隐藏于经典文本中的内在信息,为研究中医经典提供了全新视角。

清代著名温病学家王士雄,是集温病学说之大成者,他以经典为准绳,结合自身临床实践,客观地提出了诸多创新见解,推动了温病学的发展。本文通过研究王士雄“暑多兼湿”思想的发展沿革,以期探究历代医家在诠释这一思想过程中所体现的创新思想和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 1 诠释学沿革

**1.1 诠释学概念** 诠释学(Hermeneutik)的作用是“使隐晦的转换为易懂的”<sup>[1]</sup>,在《诠释学辞条》中被形容为宣示、口译、说明和解释的技艺<sup>[2]</sup>。《哲学小辞典》将诠释学的概念定义为:诠释学相当于古希腊哲学中的诠释技艺(hermeneutiketechné),在德语中被理解为解释艺术<sup>[3]</sup>,具有明显的以历史的理解及其前提的特点。从词源上考察,“诠释”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的英文释名词根为“Hermes”,即古希腊诸神信使“赫耳墨斯”,其职责是向人们传递诸神的讯息。由于语言的不同,他的传递并不是将神的指令转告人类,而是将神的指令转化为人类能够理解的语言,在此过程中已包含了赫耳墨斯本人的理解与解释,也体现出诠释学的功能——将另一世界或领域的某种思想转化到自己所处的时空中。

**1.2 从古代诠释学到现代诠释学的发展** 诠释学由最初的古典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最后发展成为哲学诠释学。

古代诠释学被用于解释《圣经》和法律条文,即注重文本本身。在柏拉图的《厄庇诺米斯》中,诠释与占卜为一类——用于解释神明的旨意。直到后希腊时期,才用于表示“有学问的解说”,但仍与宗教领域相联系。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在此时期认为诠释的意义在于“超越历史疏远化”而阐发文本的真实意义。

随后,宗教改革家提倡宗教与《圣经》的理解应当“世俗化”,应当以古典文献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圣经》,提出《圣经》“自解原则”,将诠释学与人文主义相连接,促进了诠释学方法论的觉醒和普遍诠释学形成,奠定了现代诠释学基础,诠释的重点从经典文本转移到特定历史时期或文化背景上来。随后在贝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学者的推动下,诠释学的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开始转向本体论等哲学问

题的探究,即探求不同语境下的诠释者对同一经典信息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

伽达默尔完成了诠释学本体论的转向,推动了诠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促进了诠释学的国际化发展。

## 2 中医经典诠释概况

**2.1 诠释学在中国的发展** 诠释学具有双重过程,即认为某一现象(部分)须从整体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而其又必然赋予了整体的意义。发现这些意义,然后从意义中阐释或理解这些现象存在的必然性,这种双重性又称为诠释学循环。这种理解方式的循环结构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与汉语“诠释圆环”的文字特点分不开<sup>[4]</sup>,为诠释学阐释中国传统经典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海外学子的回归和中外交流的频繁开展,诠释学进入中国,国内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率先投入对诠释学的研究之中。面对涌入的新体系,部分学者以诠释学作为基础,通过诠释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教育、文化。海内外学者试图构建起符合中国经典特色、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中国诠释学理论。汤一介教授建立中医经典文本体系“创立中国诠释学”的设想<sup>[5]</sup>,傅伟勋先生在《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构建试论之一》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创造的诠释学”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与经学典籍<sup>[6]</sup>。成中英先生基于西方诠释学与《易经》内容提出了“本体论诠释学”。

**2.2 中医经典的诠释探索** 我国自古以来便有“读书训诂”的说法,“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中医经典文本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朴素哲学思维之下,传承过程中也存在大量的校注、补注和医理阐发。近年来,诸多学者探讨了将诠释学方法运用于中医文献、临床的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具体方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杨学鹏初步探讨了中医的研究需要借助诠释学的必要性<sup>[7]</sup>。邢玉瑞认为,中医学科的分化源于《黄帝内经》,历代医家围绕该书进行了大量的训诂与发挥,从而形成了《黄帝内经》乃至中医学学术发展史。因此,对《黄帝内经》的诠释学研究也是其学术史研究<sup>[8]</sup>,并提出构建“中医诠释学”体系<sup>[9]</sup>。一些学者探讨了将诠释学应用于中医经典研究中的意义和可行性。郭蕾等<sup>[10]</sup>探讨了诠释学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杨峰等<sup>[11]</sup>认为,历代医家的注解和中医文献的实践特性使得

经典中医文献研究具有强烈的诠释学向度。另有一些学者研究了诠释学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应用方法。常富业、王永炎等以玄府为例,探索如何将诠释学方法运用于中医学中<sup>[12-13]</sup>。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诠释学方法研究《伤寒论》《温疫论》等经典中的病证、方药等,也有对六经实质、具体名词术语的研究。足见诠释学在中医经典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 3 王士雄暑湿思想研究

#### 3.1 反对“阴暑阳暑”命名,提出“暑多兼湿”观

清代以前,医家常把“暑湿”归于暑的兼证。明代医家张景岳认为暑有阴阳之分:阴暑是由于暑月感受寒邪,其实质与伤寒相似,“惟宜温散为主,当以伤寒法治之也”;阳暑是夏天感受热邪引起的病证,虽然二者的病因不同,但归根结底均源于“暑”<sup>[14]</sup>。尚没有明确论述暑与湿邪的关系。

直到清代,“暑湿”成为一个独立的病名<sup>[15]</sup>。清代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消暑丸”条下首次提出“暑必兼湿”的观点,认为长夏天气炎热,湿气蒸腾,“故暑必兼湿”<sup>[16]</sup>。汪昂在另一部著作《本草备要·草部》中进一步强调:“暑必兼湿,治暑必兼利湿,若无湿,但为干热,非暑也”<sup>[17]</sup>。认为凡中暑邪一定会兼夹湿邪,治疗时在祛暑的同时必须利湿;如果没有湿邪则只能称为热邪,不能称暑邪。可见,汪昂依据是否兼夹湿邪来区分暑邪与湿邪。此后,不少医家支持汪昂的“暑必兼湿”学说。叶天士宗其学说并补充了“暑湿”的证候和用药禁忌,认为“暑邪必挟湿,状如外感风寒,忌用柴葛羌防”“暑热必挟湿,吸气而受,先伤于上”<sup>[18]</sup>。吴鞠通继承汪昂“暑必兼湿”论,进一步提出“热与湿搏而为暑也”<sup>[19]</sup>的论断,把暑定义为湿热邪气相合而成的病邪。

清代温病学家王士雄“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sup>[20]</sup>,并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探索,提出诸多创新观点。他反对张景岳“阴暑、阳暑”的命名,认为“其实彼所谓阴暑者,即夏月之伤于寒湿者尔”,并非暑邪,而是寒湿病证,以寒湿论治,并完善了夏月伤寒的辨证。虽然治法上与张景岳“夏月暑湿实则按照伤寒论治”相似,实在有认识上的区别。

《黄帝内经》首论暑邪,认为病生于暑者为阳。《素问·五运行大论》载:“南方生热,热生火……其性为暑”<sup>[21]</sup>。指出暑性本热,为火热之气所化<sup>[22]</sup>。《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

春之暖,为夏之暑”<sup>[20]</sup>,阐明暑邪为热邪的一部分,常发于夏季。据此,王士雄认为暑性火热“纯阳无阴”,并引用《黄帝内经》之论进一步阐明暑本质上是火的观点:“所谓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也。分其阴阳,则《素问》云,寒暑六入,暑统风、火,阳也;寒统燥、湿,阴也”“热气大来,火之胜也”<sup>[20]</sup>。王士雄在其《温热经纬》中多次提出,暑邪性质为阳,暑与湿分属于阴阳,两者在分类上无关,不可同论,如果暑中包含湿,那暑为阳便不成立。

针对前人“暑必兼湿”的论述,王士雄则提出了“暑多兼湿”的观点,并以《黄帝内经》等有关论述结合临证实践予以论证。他在《温热经纬·仲景外感热病》中指出:“暑字从日,日为天气;湿字从土,土为地气。霄壤不同,虽可合而为病,究不可谓暑中原有湿也”<sup>[20]</sup>。”通过文字解析并运用相关知识分析了暑与湿邪发病机理:暑为天之气,暑性纯阳;湿从属于地气,地气为阴,二者不同;两者相兼可能是由于夏时天暑向下,沉于土地,而土之湿在炎热环境中向上蒸腾,此时发病可能出现二邪相兼的情况,且“惟夏季之土为独盛,故热湿多于寒湿”“若谓暑必兼湿,则亢旱之年,湿必难得”<sup>[20]</sup>。

至于夏季发病是否兼湿,王士雄认为取决于长夏的气候状况:当长夏季节多雨水,地气水湿较重,可能在发病时出现暑挟湿;若长夏季节干旱,人多感暑气之火热而并,则不携湿邪。“长夏湿旺之令,暑以蒸之,所谓土润溽暑,故暑湿易于兼病,犹之冬月风寒,每相兼感”<sup>[20]</sup>。”强调暑性纯阳,与湿邪并非同类,暑可以单独致病,也可以兼挟湿邪,并非热与湿相合而成暑。反对“暑必兼湿”说,确立“暑多兼湿”的观点。

3.2 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 针对暑与湿邪的治疗,王士雄创制了王氏清暑益气汤。他认为,金元医家李东垣方创制的清暑益气汤“虽有清暑之名而无清暑之实”<sup>[20]</sup>,是从补中益气汤加味而来,其原因在于东垣方并非为暑湿专创,而是广泛用于元气虚弱又感受暑湿引起的病证,所以其方偏重于健脾燥湿。湿邪来源于土,而胃为土腑,更容易为湿邪所困,因此湿邪多发于中焦,治疗上就应侧重于祛脾胃湿热,调畅气机,这是李东垣清暑益气汤立方之基。

王士雄认为,热邪甚应选用苦寒的凉性药物,配合宣化气机的药物;湿邪的治疗“宜宣、宜燥、宜利”<sup>[23]</sup>,并以泄法作为辅助;若湿邪兼并热邪,则应该“清宣疏化”并重。他借鉴《伤寒论》中喝病时暑热伤津的治法,将白虎汤运用于改善无表证的阳明

热燥,创制王氏清暑益气汤,采用具有清暑热、补气养阴作用的黄连、竹叶、荷秆、知母、西瓜翠衣、西洋参、石斛、麦冬、甘草、粳米等<sup>[20]</sup>,认为用黄连、竹叶等药物代替石膏可更好地清热解暑;而西洋参、麦冬较人参有更好的益气作用,从而弥补了李东垣清暑益气汤治疗暑邪的不足。

## 4 诠释学视域下“暑湿”观念分析

**4.1 “与时俱进”思想促使暑湿观念的再创造** 中医学发展以实践为导向,医家实践所获得的经验用于补充说明遗忘的空缺或不足,从而形成了“创造性诠释”。从“暑邪”论治的发展沿革来看,王士雄是在前人学说基础上的再创造。虽《黄帝内经》早有关于“暑”“湿”的概念,但在后世医家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新的见解。王士雄对暑湿的认识更进一步,所提出的说法更加客观,更加符合临床。

气候的变迁和地区的差异是学说发展的重要因素,温暖期促使医学继承,寒冷期促进中医创新与改革<sup>[24]</sup>。明清时期汪昂等医家身处“明清小冰河期”<sup>[25]</sup>,气候的寒冷导致降雨南移,南方地区降雨量增加,引发各类自然灾害,致使疫病爆发,促进医家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汪昂为浙江丽水人,叶桂为江苏吴县人(今苏州),“吾吴湿邪害人最广”<sup>[26]</sup>,两人深处江南一带,夏季的高温多雨造就地区暑湿易兼感,忽视了降水量较少的西北地区。《温热经纬》成书于1852年(咸丰二年),在此前后正值战乱,社会动荡,人口流动频繁,气候异常。只有摆脱自身的原有关于疾病的“人、地、天、时”判断,更加灵活地看待各类病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提出针对性的措施与方案。王士雄在临床实践中认识到前人的局限性,突破所处地域限制,认识到干旱气候或地区暑邪并不兼湿邪,为修正“暑必兼湿”的观点,提出了“暑多兼湿”论治,认为如果所谓的暑邪一定兼并湿邪,那么在干旱之年降水量减少,暑是一定不兼并湿邪的。并补充道:“兼湿者何独暑”<sup>[20]</sup>。

**4.2 “理解”与“前见”促使暑湿治法的完善** 李建民<sup>[27]</sup>提到,中医的“经验”即诠释,是以历史传统为中介的“经验”,依赖于传统典籍。古代师徒关系的确立多通过教授典籍,在这一过程中,经典文本扮演着重要媒介,而典籍传授者、拥有者则起到诠释文本与传递经验的作用。中医多依赖于文本与口述的传承,演化成“以文本为核心”的医学。即中医经典来自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文本为诠释提供了摹本,

医学的诠释受到个人经验(文本、临床实践等)的影响。伽达默尔提出“视阈融合”,认为“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sup>[28]</sup>”。中医经典的诠释是在传承基础之上的再创造,对原本文义的理解总是与时俱进的。王士雄不拘泥于前人说法,结合临床经验对《黄帝内经》理论进行再创造,中医自身所具备的实践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特点决定了中医的概念是在事实中更迭的<sup>[29]</sup>,王士雄通过实践活动完善了“暑邪”的论治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见”是任何理解的前提,理论的阐述是个人新见解的表现,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中医是一门实践应用型学科,注解和理论的发展反映的是医家自身的经验。中医习业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包含了自身实践的“前见”,在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与前人的理解有一定偏差。医学诠释实践多以问题为导向,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无法解决问题时便立足于实践情况创立新说,起到指导新实践的作用。面对暑湿的治疗,王士雄依据自身对病情的把握和对药性的理解,提出东垣方的不足之处,并将原方中的石膏、人参替换成黄连、竹叶、西洋参,创立新说,丰富和完善了暑湿的治疗方法和思路。

## 5 讨论

师承是中国古代中医传承的重要形式,包含口头传授与经典传授,对传授者、接受者而言,“理解”是关键所在。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一种,理解从属于理解者本身的历史(局限)性。诠释者受制于自身的历史性,在诠释其他客观事物时往往带着自身的历史色彩。历史性与客观事物交互影响,客观事物受不同的历史影响在不同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而诠释者可以在此过程中收获新的经验。在一切的理解中效果历史都在发挥作用,效果历史是理解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预先规定了什么值得研究、研究的对象、追求的意义与价值,诠释者的一系列创造性理解实际上是诠释过程的重要环节。

汪昂所提出的“暑必兼湿”、张景岳所提出的“阴暑”命名以及王士雄“暑多兼湿”的论治均是以诠释经典、临床治疗为目的,受制于历史环境影响下对经典的再解读与创新,是包含了自身理解的见解。中医本身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基于诠释学的视野,在经典文本阅读的过程中,立足于文本原意、注家体会,结合自身的理解进行详细的分辨与取舍,对于梳

理中医学语源流、概念辨析和中医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刘易斯·伯克, 艾伦·布里曼, 廖福挺. 社会科学方法百科全书: 第2卷[M]. 沈崇麟, 赵锋, 高勇, 主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554.

[2] 里特尔. 六点辞条系列 诠释学 辞条[M]. 潘德荣, 杨栋, 鲍永玲,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1, 11.

[3] 上海《哲学小辞典》编写组. 哲学小辞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4] 潘德荣. 诠释学导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89.

[5] 胡士颖. 汤一介《周易》解释学的哲学意义与经学启示[J]. 周易研究, 2020(6): 65–73.

[6] 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J]. 时代与思潮, 1990(2): 239–257.

[7] 杨学鹏. 开辟中医学第二战场——中医诠释的研究[J]. 科技导报, 1995(4): 17–19.

[8] 邢玉瑞. 诠释学与《黄帝内经》的研究[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4, 16(2): 7–8.

[9] 邢玉瑞. 诠释学与中医学研究述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6, 39(9): 714, 719.

[10] 郭蕾, 张俊龙. 论诠释学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J]. 中医药信息, 2006, 23(3): 1–2.

[11] 杨峰, 赵京生. 中医经典文献研究的诠释学向度[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7): 70–71.

[12] 常富业, 王永炎. 浅谈诠释学方法在中医学中的应用[J]. 天津中医药, 2010, 27(4): 267–269.

[13] 王永炎, 王飞, 杨晗. 诠释学在中医内科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医杂志, 2011, 52(7): 541–544.

[14] 张介宾. 张景岳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1055–1059.

[15] 刘娟. 祛暑化湿合剂治疗小儿暑湿感冒临床研究[J]. 中医学报, 2015, 30(1): 138–139.

[16] 汪昂. 医方集解[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67.

[17] 汪昂. 本草备要[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101.

[18]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261, 574.

[19] 吴少祯. 温病条辨白话解[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1: 25.

[20] 王士雄. 温热经纬[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自序, 36, 76, 84, 105, 151.

[21] 黄帝内经素问[M].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352–353.

[22] 灵枢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3]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研究室, 盛增秀. 王孟英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917–945.

[24] 马凯, 师旭亮, 康素刚. 历史气候学视野下的中医发展变迁[J]. 中医文献杂志, 2020, 38(5): 55–59.

[25]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1972(1): 15–38.

[26]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5: 836.

[27] 李建民. 从中医看中国文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0–54.

[28] 全亚辉. 对话哲学与文学翻译研究[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72.

[29] 于智敏. 中医概念诠释的路径[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1): 6–7.

收稿日期: 2024–05–05

作者简介: 庞森森(1999–), 女, 河南南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医各家学说及中医诠释学。

通信作者: 尚力(1966–), 男, 上海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医各家学说及中医诠释学。E-mail: dr\_shang@163.com

编辑: 孙铮